

收稿日期:2021-09-10

## “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 ——论曹文轩成长小说的尊严书写

吴学峰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尊严书写是曹文轩成长小说里常见的内容,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设计。曹文轩描写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各种表现与尊严得失,展示了青少年成长的外部环境,赞美了物质匮乏环境下的人性光辉。他也叙述了人们受挫时维护尊严的不同方式,反映了青少年尊严受损与民众群体性格缺陷之间的逻辑联系,意在引起社会对青少年精神成长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注。曹文轩把儿童文学放置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通过对个体尊严的书写,展示了民族与国家应有的形象与尊严。

**关键词:**曹文轩;成长小说;尊严;民族;精神成长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2)02-0019-07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外迁苏籍现代作家的故乡记忆研究”(2018SJZDA014)。

**作者简介:**吴学峰(1976—),男,江苏泗阳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2.02.018

作为深谙小说艺术的学者和作家,曹文轩有着丰厚的学术修养,也创作了诸多优秀文学作品。持续的文学创作使他能始终保持敏锐的学术悟性,而学术研究又以理性之光烛照着他的文学创作。上世纪90年代,他借鉴转化西方小说理论,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题,并进行了富有理性的阐述和论证,引起了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共鸣。他围绕着中国“成长小说”这个命题,成功创作了《草房子》《根鸟》等一系列独具中国乡土气息的成长小说。M. H. 艾布拉姆斯指出,成长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sup>[1]218</sup>。曹文轩笔下的少年常常要经历苦难与厄运,对抗挫折与困境,实现肉体与灵魂共同成长。“化蛹为蝶,成长了结,他们破壳为‘新人’。”<sup>[2]78</sup>他们能够清晰感知到个人尊严的存在、并努力维护个人尊严之时,就是他们成长历程中性格成熟的关键节点。尊严书写在曹文轩成长小说里常常潜藏于苦难、人性等诸多意象和主题之中,虽不是集中突出的存在,却是常见的内容和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设计。根据内容构成、载体性质或者考察视角,人的尊严可以具体分成很多类别,如秩序性尊严与非秩序性尊严、女性尊严与男性尊严,个体尊严与集体尊严,地位尊严、人性尊严与公民尊严等。曹文

轩如何书写人的尊严以及个人对尊严的维护？他小说的尊严书写有什么深层涵义？这些问题牵涉曹文轩小说的审美意义与文学价值，很值得作专题探讨。

### 一、物质匮乏环境下的尊严

马克思说：“尊严就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崇高品质的东西，就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sup>[3]6</sup>他又进一步指出，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客观存在，首先必须生产能供自己本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满足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sup>[4]</sup>。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实现个人尊严的基础和核心。在中国日常世俗生活中，个人若不想丧失尊严，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拥有与众人相当的物质生活资料；如果要获得无可非议的钦佩，那么就要在一般在物质层面超越众人。曹文轩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大多生活在物质匮乏时期的乡村或城市边缘，对物质生活资料有着强烈的渴望，更在意从最基本物质层面如衣食住行上维护个人的尊严。

曹文轩始终着力表达美好人性与高尚道德。然而人性与道德很难凭空表现，曹文轩侧重从日常的衣食住行等角度出发，来反映人物的价值追求与精神境界。先就服饰来说，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御寒遮羞，但也承担着人们展示自我、表现成就等功能。一般来讲，整洁得体的穿戴是向他人表示尊重的重要方式，也是获得他人尊重的重要因素。《蜻蜓眼》里，奶奶奥莎妮在家庭处于经济与政治双重压力之下，改缝了自己年轻时穿的长裙，为孙女阿梅做了件得体的钢琴演出礼服。礼服浸润着奶奶的记忆和关爱，也象征着祖孙二人对尊严的守护。阿梅遭受歧视而失去演出资格，但始终注意不让礼服受到玷污。奶奶为抚平阿梅内心的创伤，举办家庭演奏会，隆重穿上了旗袍，戴上珍贵的首饰“蜻蜓眼”，以表示对孙女的尊重。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尊重，让他们在混乱时代中活出了尊严。保持服饰整洁得体是在困境中维护尊严的一种姿态与方式，但服饰不可能永远掩盖住或根本改变个人的身份与本质。《山羊不吃天堂草》中，在城市打工的明子等人，区别于城里人的显著标志就是衣着。他们被商店橱窗里耀眼的旅游鞋、貂皮大衣深深吸引，昂贵的价格让他们觉察到了与城市的隔膜，感受到了身份的“卑微与无足轻重”。城市的女孩紫薇注意到明子，首先观察到他的衣着，为了感谢明子的帮助送给他围脖和棉帽。明子接送紫薇时，特地买了天蓝色的绒衣和白球鞋，“觉得这两件东西，使他变得很有光彩。当他走在阳光下，受着太阳暖烘烘的照耀时，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激动。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成长着，连血液都比过去流得温热和有力了”<sup>[5]92</sup>。服饰让明子觉得获得了尊严，产生了地位提升的错觉。然而，紫薇在身体恢复健康后就疏远了明子，甚至用金钱切割两人之前的关系。明子尊严大受损伤，他从情感错觉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应该像家乡宁愿饿死的“山羊”，“不该自己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吃，也不肯吃”<sup>[5]253</sup>。当紫薇再次瘫痪落魄时，明子虽报以同情和鼓励，但还是坚决离开了这座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服饰装扮的改变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脱离身份与能力的刻意遮蔽反而会弄巧成拙。

服饰是生命存在之后的需求，而饮食才是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讲究饮食礼仪，非常介意在众人面前的吃相。然而在生存和礼仪面前，前者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曹文轩小说里有个常见的情节，就是吃别人的剩饭。《樱桃小庄》里，麦田和妹妹四处寻找失踪的奶奶，麦田为了省钱给妹妹买东西吃，自己到饭店吃剩饭剩菜。《火印》中，坡娃进城寻找被日军抢走的马，身无分文时只能去讨客人咬过的包子，还抢了个包子给同伴。这些行为无疑损害了个人尊严，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争取更大的尊严，他们首要选择就是活着。曹文轩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大水》里，就对生存与尊严之间的矛盾作了诠释。小说中拉手风琴的人向孤儿瓢儿传授人生经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不要顾影自怜”，靠自己走路，当

然会有痛苦,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痛苦。那刻骨铭心、让你泪流满面、让你咬牙切齿的痛苦。要珍视它,特别特别地珍视它!”<sup>[6]94</sup> 讨要剩饭导致尊严丢失固然让人屈辱痛苦,但有时必须忍受屈辱痛苦,才可能实现人生目标,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体现在物质上就是要有遮风挡雨的住宅。住宅的好坏,关系到中国人的脸面大小。杜小康大红门的家(《草房子》)、马水清青砖大宅里的家(《红瓦》)、程采芹深宅大院的家(《天瓢》)等都彰显出主人不同寻常的地位和尊严。这些房屋在物质匮乏年代的农村毕竟属于少数,更多的情况是,几间草房已经算很不错的。草房子是曹文轩小说里具有代表性的审美物象,“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茅草“一根根地皆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这种茅草盖的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显出一派华贵”<sup>[7]5</sup>。《金色的茅草》里,青狗母亲因为青狗父亲连草房子也盖不起而和别人私奔,青狗父亲为挽回尊严,到海滩割茅草盖房子。《青铜葵花》中,青铜父亲带着青铜到海滩割茅草回家建新房子,当草运到村前,“一船茅草,简直就像一船金子。华贵的亮光,映得岸上观望的人,脸成了金色”<sup>[8]114</sup>。村民对青铜家刮目相看,认为最穷的人家要兴旺了。茅草房子浸润着主人的辛酸和汗水,也给主人带来了幸福和尊严。

在相对封闭的年代,农村人很少有机会出远门,对交通工具的需求不像衣、食、住那样迫切,但拥有或能使用别人没有的交通工具也会提升个人尊严感。曹文轩小说故事发生地大多在盐城,盐城是水乡,在这里,船是常见的交通工具。《田螺》中,村民怀疑曾有前科的何九偷了村里的船,何九没有争辩,拼命摸田螺赚钱,最后为村里买了条大船。“那条木船是用上好的桐油油的,金光灿灿,仿佛是条金船。船样子也漂亮,两头翘起,船舱深深。手工也好,不细看船头板,都看不出木板间的缝隙来,船帮上的铜子钉得很均匀,很扎实。木料也是上等的。”<sup>[6]193</sup> 这种维护自尊的极致方式,震撼了真正弄丢船的孩子六顺,也影响着他的漫长人生。《草房子》里,学生们请求毛鸭撑船帮他们渡河,结果毛鸭根本不理他们,连桑桑这个校长的儿子都不放在眼里,只有杜小康喊他才答应。这无疑让杜小康脸上增光不少。杜小康是学校唯一拥有自行车的学生,拥有被众人羡慕崇拜的地位。桑桑为了能骑上自行车,只能暂时放下尊严。随着对杜小康了解的增进,他后来更佩服杜小康家道中落而不自卑的坚韧品格,对人性与尊严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在中国人世俗认知中,个人占有物质资料的多少与尊严成正比,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准则,有时会有道德、权力等因素的介入。就像明子、杜小康虽然失去了某些物质资料,但没有丢失人格尊严。曹文轩书写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层面的种种表现与尊严得失,不是为了渲染生活贫困与时代苦难,而是为了展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尊严的认知,以及推动他们精神成长的外部环境,也是为了呈现物质匮乏环境下的人情温暖与人性光辉。

## 二、精神成长过程中的尊严

人的尊严是动态发展的,人对自尊的认知有个渐悟过程。曹文轩为了表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对尊严的渐悟与维护,除了从物质层面衬托,也会在精神层面作直接描述。《天瓢》中,外来户杜少岩是地主程家的长工,儿子杜元潮和程家小姐采芹自小就是玩伴。两家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两个孩子的友谊在众人眼里就成了不正常的关系。富家子弟邱子东感到嫉妒,处处捉弄欺辱杜元潮。后来,杜家父子被逐出程家大院,被安置到远离程家的草屋居住。少年杜元潮经历了这些屈辱,在懵懂中产生了自卑意识,也逐步被唤醒了尊严意识,这两种意识交织支配了他一生的行为。杜元潮面对骄横跋扈的邱子东,很长时间里都是忍气吞声,直到能力和地位全部超越邱子东。曹文轩将人的尊严抛到时代河流里去淘洗,两人地位的转变,表现了人生命运在历史大

潮中的无常状态,折射出人的尊严有着历史的烙印和属性。面对席卷而来的历史浪潮,维护个人尊严的方式有时只能是忍耐或妥协。《蜻蜓眼》里,阿梅去学校参加演出,到现场才知道已经被取消了表演资格。《红瓦》里,林冰到学校参加乐队排练,却在现场被无视和抛弃。面对尴尬的场面,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精神煎熬,也对维护尊严和尊重他人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林冰的理解是:“这场煎熬对我日后的悲悯情怀大有益处。在我成人之后,尤其是在我有所发达之后,我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便是使人尴尬。我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因为我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而陷入尴尬处境。一旦无意中发生,我便不顾一切地去消解它,并在心中深深地负疚多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那些乐于使人尴尬的人,我的心中会暗暗地生长出仇恨。”<sup>[9]223</sup> 尊严受损改变了处事的态度,促进了精神的成长。这也说明,人的尊严既具有历史性,也有着相对性。所谓相对性,“是指人的尊严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过程”<sup>[10]</sup>。曹文轩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sup>[8]215</sup>。在他看来,人必须要有坚强的内心与悲悯的情怀,才能从挫折中坚挺过来,才能在更大苦难面前保持好风度、维护好尊严,才有资格创造美好未来。由尊严受损而培养出坚忍品行和悲悯情怀,是曹文轩笔下少年精神成长的基本条件。林冰(《红瓦》)、杜小康(《草房子》)、根鸟(《根鸟》)、明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麦田(《樱桃小庄》)等孩子都是在感到尊严受挫之后,才变得更加坚忍,真正走向成熟。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困难与挫折,当然需要能出手相助的外部力量,然而最需要的还是自己敢于和苦难挫折搏斗的精神。但他们维护尊严的方式不仅有沉默忍耐,也会有不同形态的反抗。《草房子》里,陆鹤因为头秃,被同学们百般嘲笑,并被叫做秃鹤。他最初采用生姜抹头、戴上帽子、不理睬等忍耐的方式,试图摆脱同学们的嘲讽,当得知学校不让他参加会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彻底的伤害,从而产生了对抗情绪。他用独特的方式,让学校丢掉了快到手的荣誉,也报复了全校师生的轻慢和侮辱。陆鹤维护尊严的方式看上去怪异稚气,但这些行为的发生有着师生歧视的因素,所以让人感到沉重和不安。最终,陆鹤毛遂自荐参加话剧表演,利用自己的外貌特征,成功扮演了杨大秃瓢,用勇敢和努力赢得了尊严。孩子们从他的精彩演出和委屈哭泣里,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本应有尊重。然而,如果陆鹤没有直面屈辱的勇敢和积极向上的执着,会不会在众人歧视之下产生扭曲心理,进而走上恶意对抗社会的歧途?曹文轩笔下还有不少类似陆鹤这样用怪异行为来维护自尊的少年,他们做出这些言行的原因很值得探究和反思。《灰娃的高地》里,灰娃是个破落家庭的孩子,父亲是个残疾人。他在村里遭受着孩子们的歧视和孤立,只能到荒芜的坟场与稻草人玩战争游戏,以抚慰孤独和受伤的内心。然而,村里孩子连坟场也要霸占,使用暴力驱赶灰娃。灰娃面对残忍的殴打,始终坚韧地占据着坟场“高地”,最终吓退了“敌人”,挽回人格尊严。《阿雏》里,阿雏六岁时,父母因渡河翻船被淹死。村民把这场悲剧当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未表现出悲痛和忏悔之情,特别是大狗的父亲还处处宣扬在水下摆脱阿雏父亲纠缠而逃命的“荣耀”。阿雏既痛恨村民没有救他的父母,又认为村民处处歧视他,所以经常在村里搞些恶作剧,成了个讨人嫌的孩子,更谈不上有所谓的尊严。他将霸凌大狗当成了快意恩仇的行为,但是在一场水灾里,他为了拯救大狗而献出了生命。他没有冤冤相报,而在生命最后一刻超越村民普遍的道德意识,守住了人性底线和人格尊严。小说讲述的不是儿童之间的简单争执,而是反映了少年做出怪异言行、形成叛逆性格的多重原因,意在警醒人们对人格尊严、生命尊严要持敬重态度而非冷漠歧视的眼光,希望人们认真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及环境。

叔本华在如何评价人方面,主张“不要考虑他邪恶的意志,也不要考虑他偏狭的理智和刚愎无常的观念”,“应当去关注他的遭遇、他的需要、他的焦虑和他的苦痛”,但也指出“执着于仇恨和蔑视的迷途,是注定找不到人的所谓‘尊严’的”<sup>[11]506-507</sup>。秃鹤、灰娃与阿雏最后都没有执着于仇

恨,而用行动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也获得了人性的尊严。同样是叛逆的青少年,《红瓦》中的乔桢从未走上正轨,也就始终没有获得尊严。乔桢有着不光彩的出身,自小就遭受着人们异样与歧视的眼光。他心理遭受了严重扭曲,一直处于自卑、嫉妒与仇恨的精神状态,因而经常欺辱霸凌弱小,喜欢用造谣污蔑的手法攻击或报复他人,最后因杀父而被捕。《天瓢》里,杜元潮一生都没有摆脱儿童时期形成的自卑感,为修补曾经受损的自尊,处处设计压制报复邱子东,一步步走上了作风不正、贪污腐败的道路。乔桢、杜元潮有着难以饶恕的罪行,但造成他们扭曲心理和悲剧命运的内外原因并不单纯简单。从这个角度看,秃鹤、灰娃、阿雏离乔桢、杜元潮的人生歧路也就是一步之遥。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与精神健康,是曹文轩通过小说尊严书写向全社会提出的需要关注重视和思考解决的问题。

### 三、民族与国家的尊严

曹文轩成长小说的尊严书写,主要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大多属于个体的情感和人格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目光只囿于个体。曹文轩认为,“中国作家肩负着塑造中华民族的崭新性格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深度力度的作品;也只有站在这个高度,它才会更好地表现善良、富有同情心、质朴、敦厚等民族性格的丰富性”<sup>[12]</sup>。曹文轩把儿童文学放置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高度,可见他的成长小说不会止于关注个体尊严,也会着眼民族精神、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丰富璀璨的文化瑰宝。“这并不等于说这个民族就尽善尽美。更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民族在性格方面的明显缺陷视而不见。任何民族都负有不断改造、革新进步的历史重任。”<sup>[12]</sup>曹文轩小说大多从少年儿童和成人两个维度来展现群体精神面貌,书写了人们在尊重他人方面存在的群体性格缺陷。《草房子》反映了少年儿童存在的群体性意识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生集体性戏耍侮辱秃鹤事件。学生们没有尊重他人的意识,也普遍缺乏同情心,这是秃鹤捣乱的根本原因。还有板仓小学的三个男生合伙歧视欺负孤女纸月,集体无意识的冷漠和暴戾,是纸月转学的直接原因。虽然这两方面的问题最后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不能轻易滑过。如果没有秃鹤的上进,没有桑乔的介入,这些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那些歧视或欺负他人的孩子,最后能否真正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能否认识到快乐不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能否顺利走上健康的成长道路?这些问题可能都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当然可以把孩子们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年幼懵懂无知的原始状态,那么成人之后是不是就不存在这类问题了?长篇小说《红瓦》《蜻蜓眼》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红瓦》里写道,在特殊年代,“所有人都不再安分了,人们不再总待在地里和屋子里,油麻地小镇老是一团一撮的人。人们聚拢着,一个个都想合伙弄出一些事情来”<sup>[9]99</sup>。他们已经沦落到与“时刻准备着去嘲弄,去耍笑,去折腾,去耍挟,去打击识字的人”的无赖同等的道德水准。他们无法理解丁黄氏、丁杨氏守护大床的真实意图,于是用污秽淫荡的语言去想象理解她们与丁韶广的真挚情感,用残忍的手段摧垮她们最后的尊严。《蜻蜓眼》中,朱达雄一伙人在特殊年代,涌入阿梅家里巧取豪夺,抢走了奶奶的精神寄托“蜻蜓眼”,还打断了爷爷的左腿。成人世界里摧残他人人格尊严的丑陋现象,必然会在少年儿童心里留下难以消弭的阴影,让他们对人格尊严有了深刻而复杂的认识与思考。

曹文轩透过少年儿童的眼睛呈现国民对待人格尊严的群体性缺陷,这既有着批判国民性的意图,也表达了对少年儿童成长环境的焦虑。他显然受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传承和转化了鲁迅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传统。他说:“鲁迅是对我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鲁迅的儿童观、鲁迅小说的少年视角、悲悯情怀等都对我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sup>[13]</sup>他站在维护民族尊严

的高度,但没有耽溺于寻找丑陋、无限批判的泥淖之中,反而会批判某些“现代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热衷从粗鄙物象里挖掘所谓“深刻”的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哪怕是在极端强调所谓现实主义时,是不是还要为这个民族保留住一份最起码的体面呢?如果连这最起码的体面都不顾及,尽情地、夸张地,甚至歪曲地展示同胞们的愚蠢、丑陋、阴鸷、卑微、肮脏、下流、猥琐,难道也是值得我们去赞颂它的‘深刻’之举吗?”“不遗余力地毁掉这起码的体面,算得了好汉吗?可怕的不是展示我们的落后和贫穷,可怕的是我们在落后与贫穷状况下简直一望无际的猥琐和卑鄙,可怕的是我们一点也不愿保持体面——体面地站立在世界面前”<sup>[14]</sup>。民族尊严建立在个人尊严基础之上,个人尊严难保必然导致民族尊严丧失。曹文轩反对文学创作一味进行无操守的暴露,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积极的中国人形象,描绘了民族应有的气质与尊严。《草房子》里的杜小康在家庭衰败之后,不卑不亢地在校园门前摆摊,被校长桑乔预言为油麻地未来最有出息的孩子。麦田(《樱桃小庄》)、根鸟(《根鸟》)既能坚忍地面对艰难险阻,又能在金钱财物面前抵制住诱惑,从而保持做人的尊严,毅然决然奔着既定的目标前行。《三角地》里的大哥,带领弟弟妹妹自我革新,让家人重返生活正轨,获得了人格尊严。《蜻蜓眼》通过塑造爷爷、奶奶、阿梅、宋妈等形象,表明中国人面对历史劫难与个体死亡,都应该保持高贵的姿态和生命的尊严。曹文轩着力在小说里构建“好人比实际生活中的好人还好,而坏人也是比实际生活中的坏人要好”的世界,就是为了让儿童读者能深刻感受到苦难,也能从这个世界里获得贵族气质和优雅风度。曹文轩描绘了中国儿童应有的精神风貌和应走的成长路径,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批判了国民性的缺陷之处,又应和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

康德说:“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sup>[15]</sup>与个人尊严相比,民族尊严、国家尊严更是没有等价物可以替代。曹文轩的抗战题材小说《火印》鞭笞了日本侵华的罪恶,颂扬了中国少年对民族尊严的捍卫。雪儿是坡娃与日本军官河野眼里举世无双的骏马。当雪儿被河野霸占之后,坡娃为夺回雪儿,最后失去了一条腿。小说刻画了不畏生死、坚强不屈的坡娃形象,还采用以物喻人的手法,赋予了骏马雪儿人性和尊严。雪儿坚决不接受日本人的优待,不做日本侵略者的战马,最后配合中国军人报仇雪恨,始终捍卫着民族与国家的尊严。《火印》还借日本小兵稻叶的命运,反思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显然,小说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坚定决心,也弘扬了超越民族界限的道义观和悲悯情怀。可以说,曹文轩小说尊严书写的题材来自中国,而主题内涵跨越了国界,属于全人类。

#### 四、结语

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关注个体对尊严的渐悟与维护,追求对优良人性的充分表现,充满着人情温暖与道义光辉。他从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着眼,描写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维护尊严的种种表现。人不会永远停留在满足物质享受与官能欲望的层面,总会有更高的精神需求和价值目标,那么对尊严的认知就有个发展过程,维护尊严也会有多种方式。曹文轩从历史的苦难与厄运之中,挖掘再现人们维护尊严的不同方式,对人性的精神光辉给予彰显,对国民存在的群体性格缺陷给予委婉的批判,意图引发人们的重视与反思青少年的成长及其社会环境。他认为,文学肩负着塑造民族性格的使命,书写个体尊严其实也意在展现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应具有的尊严。“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无法创造出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sup>[16]</sup>曹文轩本着这样的文化自信和文学目标,成功地让中国儿童文学有尊严地走向了国际文坛,也将中国人的形象体面地展现于世界舞台。

## 参考文献

- [1] 艾布拉姆斯 M H. 欧美文学学术语词典[M]. 朱金鹏, 朱荔,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218.
- [2] 曹文轩. 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98: 78.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6.
- [4] 季素娇, 戴锐. 马克思人的尊严思想及其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6): 35 - 40.
- [5] 曹文轩. 山羊不吃天堂草[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 [6] 曹文轩. 狗牙雨[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8.
- [7] 曹文轩. 草房子[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5.
- [8] 曹文轩. 青铜葵花[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
- [9] 曹文轩. 红瓦[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 99 - 223.
- [10] 张三元. 人的尊严的唯物史观基础[J]. 理论学刊, 2016(2): 92 - 100.
- [11] 叔本华. 叔本华论说文集[M]. 范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06 - 507.
- [12] 曹文轩. 我的写作之路[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6(6): 1 - 6.
- [13] 曹文轩, 徐妍. 古典风格的正典写作[J]. 人民文学, 2016(6): 116 - 120.
- [14] 曹文轩. 天瓢[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7.
- [15]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苗力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
- [16] 曹文轩. 蜻蜓眼[M].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6.

## On the Theme of Dignity in Cao Wenxuan's Initiation Stories

WU Xue-f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The writing of dignity is not only a common cont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desig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Cao Wenxuan's initiation stories. The writer describes people's various gains and losses in terms of dignity at the level of basic material means of life, such as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He reveals the difficult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eenagers' growth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face of material scarcity. Cao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people maintain their dignity while facing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 unveiling the 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airment of teenagers' dignity and the personality defects of the public. He appeals for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eenagers. Cao considers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a conditioning factor of the future national character. Through the writing of individual dignity, he shows the due image and dign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country.

**Key words:** Cao Wenxuan; initiation stories; dignity; nation; spiritu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王建霞〕